

谭伯牛老师：
您好。大作《天京之围》前两天收到了，真是厚厚的一本。打开都需要一点仪式感，倒杯酒啥的。阅读和书各有各的尊严，我想这是一种礼仪。

谭老师的历史写作，恰好是我这些年来感兴趣的。人到中年，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变化之一。但对历史的兴趣，好像从小就有，爱看《三国演义》算不算？中学班主任收走了这本在课外看的闲书之后，还是会给我一番鼓励，鼓励我认真学习历史。他倒是一个并不全看学习成绩的人，只是我也能理解某种动机——以史为鉴，他没这么说大。反而他有个对我来说很有趣的说法，说希望我能在历史中找到自己。像个游戏，或者有人帮我出了一个谜题。我老师的原话是，去找一个历史上跟自己很像的人。这个游戏确实有点意思，用这样的动机去学历史，读历史，别有一番乐趣。可惜我在各种各样的历史书中找了很久，依旧无功而返。后来我也知道不是每个游戏都会通关，有些游戏注定是没有结果的，就像人生。少年多感慨，谭老师见笑。

直到了上大学，我的老师们都挺有个性，灌输给

聊聊『以史为鉴』

谭伯牛 小饭



见字如面

我一些冷门金句，比如意大利著名史学家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又比如更俏皮的说法：“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当时听得我一愣一愣，然后我忽然产生了一些虚无感。虚无感对个体来说好像有百害而无一利，以我打比方，我从没有在虚无感中得到任何好处，本身就没什么愉悦。不知道谭老师你是如何对抗虚无感的？抑或，在日常之中，很多人其实不会产生虚无感？我真的很好奇。

回到开始的话题，如果还能让我维持一些兴趣的，那就是从历史之中找到所谓的自己。不知道谭老师在写历史的时候，对这些历史人物是带着怎样的感情。这也是我好奇的。你喜欢里面的谁吗？曾国藩值得吗？左宗棠、李鸿章他们都值得吗？我想听你的回答。

闲叙一番，盼谭老师回信。

小饭
2025年4月

小饭：
兄好，迟复为歉。拙撰请多批评。兄是小说家，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天生与史学亲近，因为历史叙事不过是从文本到文本的过程，文本之外，再无

大学从教40多年，2021年写了一本小书《从青椒到思想者》，总结大学教师的成长要有学历、经历、阅历三部曲。其中，学历是门槛，经历是阶梯，阅历是升华。在我看来，“三历”需要递进升华也同样适用于许多其他领域。例如，好的作家就是要有一定写作能力、有趣人生故事、独特思想见识的三元函数。

学历是专业研究的准入证。1979年我大学毕业留校任教的时候，大学老师还没有多少人有研究生学历。进入20世纪90年代，教育主管部门推出在职攻读博士的政策，促使一批留校的青年教师完成了博士学位。那时候有许多已经当了教授、院长甚至校长的人，也回过头来读博士。改革开放40多年，现在国内大学新入职教师已经是清一色的博士学位。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大学之理念》(1923年)中强调学术自由与专业性关系，指出“学术自由需要以学术严谨为前提”。剑桥大学图书馆一直保留着牛顿当年演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手稿，泛黄的纸页上密密麻麻的公式推导，就是扎实学术地基的注脚。我记得我1994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访学期间发表第一篇SSCI论文，光是尾注就有十几页长，从引用到处到标点符号，为了符合学术规范花了很长时间。事实上，获得博士学位需要经历时间、意志、规范、能力、成果等煎熬和磨砺，这使得有学术志趣的年轻人进入大学做研究，能够更规范更专业地做出有特色的工作。

独立的真相与事实。譬如《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志》谓曹操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演义》则说他不过是“乱世之奸雄”，析而言之，一文一史，其实，等而言之，皆是文本，二者以外，并无曹操。当然，后现代主义者强拆传统史学大厦，不成片段，破坏之力甚巨，却无意建设，极有诗意，只是苦了普通读者。

普通读者都知道“以史为鉴”四个字，老生常谈，谈何容易。近几年我对此四字有了新评价，略谓，工业革命以前的历史对现代人来说没有借鉴价值。农业革命发生在一万年前，文字出现在五千年前，工业革命兴起则在二百年七十年前。以史为鉴的史，指的就是文字出现后五千年间发生的事情，对国史来说则是三千余年。

以史为鉴的下一句，是“可以知兴替”；兴替，就是改朝换代。商汤灭夏，文献不足证，周兴代商，后人或疑“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国史上叙述翔实的改朝换代，应从秦朝灭亡、刘邦建国开始，直到宣统三年满洲贵族与民国政府的权力转移。这两千年间的“兴替”，确实能够“以史为鉴”，因为每个朝代的国号虽不一样，但之所以兴起、之所以灭亡的教训都差不多。

然而工业革命之后，二百年来人类创造的财富与资源，几乎百倍于前五千年的总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提高人类寿限，交通与信息的发达则让每个现代人在一生中体验到五千年来人类从未经历的变化。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的变化，甚至哪怕是二者兼具的，譬如游戏与互联网。更重要的是现代政治建立在工业革命的基础上，成王败寇的传统“兴替”已成陈迹。

战争不再是为了开疆拓土，而是打开市场，李鸿章面对这项“前史所未载”的巨大成就，不禁感叹“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古代有皇帝，现代所无(虚君共和不是真皇帝)；现代有电，古代所无。这是我概括的古今之别，天上人间，两个世界。工业革命后的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切价值必将重估，包括以史为鉴。今人既无可借

经历是学术阶梯的建造者。从留校开始当青椒，我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嘱自己要过好教学关和科研关。后来成为资深教授，遇到新入职的青椒来咨询，我会说“效法其上”，一开始就做好职业计划。做学者搞研究讲中国故事当然也要反对“四唯”或“五唯”，但是要懂得先站住、后站高才可以有真正的学

大学老师的学历、经历和阅历

诸大建

术自由。博士毕业当大学老师，现在规定要有两个三年即至少六年的严格KPI考核，就是强调在教学和科研方面要有好的开始和积累。我常常说发表顶刊论文没有2篇以上，拿到国家课题没有2次以上，不能说科研实务能力已过关。对于在教学和研究上基本站住脚的青椒，我会建议不要急于做那些分散注意力的横向课题，要把精力花在自己的科研根据地搞出名堂来。在大学当老师，我觉得需要用杜威“做中学”的教育哲学做向导，真正的知识产生于持续不断的解决问题的过程之中。事实上，我们这一代、周围的同事以及我的学生中同样是博士毕业的青椒，后来的经历是越来越分化的。有的很早甚至不到六年就当教授，有的博士毕业十多年仍然不是副教授。

阅历是思想认知的升华者。但是经历不等于阅历，相似的经历不一定有同样丰富的阅历，从经历到阅历需要升华。经历是经过

的事情，阅历是对经过的事情的认知、解构和重构。阅历如同将葡萄酿成美酒，需要时间与反思的双重催化。我当教授到现在小30年，一个重要感悟是在低水平上重复做事情是收益递减的，关键是要咀嚼和反刍，把经历转化成为阅历。因此看到有的青年教师，很早就发表了顶刊论文，获得了国家课题，晋升了教授；但是仍然停留在发论文拿课题、数学术GDP的状态。在合适的场合，我会善意提醒他们，现在的重点应该

是用自己的思想影响学术界。我自己常常会隔一段时间对自己的研究进行三个维度的反思，横向维度比较中国与外国，纵向维度审视历史与当下，价值维度平衡学术与社会。这样，不管是向上讨论理论问题讲why，还是向下讨论实践问题讲how，都可以打破停滞不前，讲出一些有深入思考的新话来。

2005年，我在哈佛大学做高级研究学者，印象最深刻的是哈佛人喜欢说一句话“这里是哈佛”，强调崇尚人无我有的新思想。我的感悟是：在大学当教师需要有高学历做敲门砖，但是更需要在学术深耕中铸造专业利刃，在反思沉淀中实现认知跃迁。特别是中国当前的发展既要



银幕后

上海的6月多了一句问候语：票子抢到了吗？上海国际电影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买票到了抢票，一字之差却直观体现了电影节的热度和在影迷心中的分量。今年电影节开票以后，有一段老电影《太太万岁》里上官云珠和苏芬的对话片段，在朋友圈被不少人转了又转，对话是：“气死了，大光明的票子都卖完了，美琪的片子也不错呀。”一百年前和一百年后，票子难抢的情况如出一辙。

印象中，第一次看电影是读小学的时候。20世纪90年代上学的孩子应该都记得，那个时候学校有一项传统活动叫组织看电影。我小学就读于老卢湾，离学校最近的电影院就是国泰电影院。有一年学校组织我们去观看动画电影《宝莲灯》，那个时候的国泰还是木质结构的座椅，所以只要有人从座位上站起来，就会发出木板“啪嗒啪嗒”敲打的声音，但那天被几百名小学生填满的电影院居然全程秩序井然，毫无杂声。我想这不仅仅是因为动画片本身的吸引力，也因为那块光影大幕所传递出的神奇魅力——现实与梦境之间只差一块银幕的距离。

再后来，看电影就成为了学生时代最主要的娱乐活动之一。那时获取电影资讯的方式还不是很多，不像现在，手机一查马上就知道放映的时间、地点，甚至还可以看到预告片，当时是需要亲自跑去电影院看排片表、提前买好的，很有仪式感。看电影是一件专门去做的事情，不像现在，吃饭顺便看个电影，逛街顺便看个电影，那时候看电影可是一件很郑重的事情。

若干年后，电影节招募志愿者，我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慢慢地，我成了电影见面会的主持人，从观众席中走向了观众席前，从观众变成了观众与电影人沟通的桥梁。

银幕后，故事未完待续

刘晔

满架图书消日月 (隶书) 毛节民

一庭花鸟记春秋

滿架圖書消日月
一庭花鳥記春秋

鳥日滿架
記月架一番
舊一庭書
秋庭書消

编者按：2005年7月1日，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在浦东丁香路盛大启幕。一路走来，无数个难忘的瞬间，构成东艺二十年的璀璨篇章。你的故事我的歌，今日，“我与《蝴蝶兰》”情缘娓娓道来……

2004年12月31日，浦东新区的夜空被一朵盛开的“蝴蝶兰”点亮。那一晚，我22岁。东艺，揭开面纱。在开幕音乐会上，我演奏了《黄河》。那时候的我和东艺都很年轻，就像两个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准备一起闯荡世界。

20年间，我和东艺共同创造了无数经典瞬间，有些演出，现在想想还是觉得刺激，甚至有点“玩命”。比如，2008年，我与艾森巴赫执棒的费城交响乐团，合作格里格钢琴协奏曲，庆祝中美建交30周年的背景让音乐会充满历史温度。艾森巴赫是我的恩师，费城又是我曾

经求学的地方。所以感觉特别亲切，弹得格外有感情。

2012年，我与“姐夫”捷杰耶夫的牵手，堪称惊心动魄。捷杰耶夫希望，全场演出普罗科菲耶夫作品，并钦点我担任“普三”的钢琴独奏。当时我的档期忙到连经纪公司都无法协调，东艺辗转找到我，最终我来到了上海。捷杰耶夫是出了名的不按套路出牌。演出前，我以为有充足的排练时间，结果只试了开头5分钟，捷杰耶夫大手一挥，决定直接演。5分钟？！我的心疯狂打鼓，差点跳出来。最终，我弹得热血沸腾，捷杰耶夫指挥得风驰电掣，乐团的声音像西伯利亚的暴风雪席卷全场。俄罗斯乐团血液里的激情，让“普三”迸发出惊人的能量。弹完后，我长舒一口气，太刺激了，比坐

过山车还过瘾，我直接睡了一个好觉。后来我一直说“和‘姐夫’合作，要有一颗大心脏”。

如果一定要选，维也纳爱乐乐团肯定是我的最爱。自从2005年在美京宫首次合作，我就成了维也纳爱乐的常客，至今已合作70多场。2016年，东艺与维也纳爱乐签署五年战略合作协议，约定未来五年，乐团每年都以全团阵容登临东艺。2018年，我与维也纳爱乐同台，带来莫扎特《第二十四号钢琴协奏曲》。当你听到那种不可复制的声音，就知道这是维也纳爱乐。维也纳爱乐一直维持着传统的“维也纳之声”，音色既像丝绸又像珍珠，有种说不出的高贵。

2020年12月9日，东艺

见证了我艺术生涯的重要转折——在上海首秀巴赫《哥德堡变奏曲》。1500张门票，开票15分钟即被秒杀，在东艺的努力争取下，我在次年1月加演了一场，依旧秒没。我从八九岁开始每天将《哥德堡变奏曲》当基本功来练，但总觉得差点味儿。这部巨作像个迷宫，越弹越深，根本看不到尽头。成年后，我无数次想公开演奏，却总在最后一刻退缩。30岁那年，我想把它当生日礼物，还是没准备好，打了退堂鼓。38岁的我希望突破自我，弹出更深的音乐，《哥德堡变奏曲》对我来说是一个成熟的开始。坐在舞台中央，被音乐环绕，被观众包围，我就像在葡萄园里收获艺术的果实。我喜欢东艺音乐厅的葡萄园式设计，声音像月光一样均匀洒在

每个角落，连最轻的触键都能传到最后一排，整个音乐厅变成了巨大的共鸣箱，所有人的心跳都在跟着音乐走。

第一年1月，加场演出的同一个月，我的儿子出生了。我的每一次转身和蜕变，东艺都陪在身边。我在这里尝试过最疯狂的合作，也在这里找到最安静的自己。可以说，东艺不只是老友，更像我的家人。一转眼，东艺20岁了。弹什么曲子送给它？要不就李斯特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够华丽，够热闹！或者，换成门德尔松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也行，最近练得正熟。有一点肯定的是，下一个20年，我和东艺还要一起玩刺激的音乐。

十日谈

我与“蝴蝶兰”责编：华心怡

回首20年，我与妈妈看演出的票根已攒成了一本册子。

光影流淌间，我与电影节也结下了十年的缘分。这十年间，我主持了超百场见面会，但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些可爱的影迷们。我曾经听过影迷在上海影城的千人影厅内，为当天过生日的黄建新导演唱生日歌；也见过为了确保能抢到心仪的电影票而带着小板凳在影院外通宵排队的影迷；还采访过从第一届开始就一届不落的资深影迷，他收集的电影票根、海报、手册连组委会都为他竖起大拇指；遇见过从第17届到27届每届都在大光明同一位置合影的年轻影迷，影像不仅记录下了他们的青春岁月，也见证了他们从爱好者变成了从业者……

当电影落幕，落幕后的故事还在延续，而这些或温暖或励志的故事皆是由影迷用心用情不断书写着。